

序 说

—

人的生命只有一次。每个人都是在对人生茫然无知的时候，就匆匆踏上人生的旅途。等到对人生有所感悟时，人生的某一阶段已经过去，从中获得的人生经验只能供今后参考，走过的路不可能再走一遍了。至于对人生全面透彻的了解，需要有人生的全部阅历，只能走完人生的全程后才能做到；但那时生命之光已经熄灭，对人生的比较全面的经验只能供后人参考，自己不可能重新开始人生的旅程了。

但人生是宝贵的。宋高濂说：“天地有万古，此身难再

得。人生只百年，此日最易过。幸生其间者，不可不知有生之乐，亦不可不怀虚生之忧。”（《座右编》）要想把握住匆匆而过的人生岁月，处理好人生的各种问题，我们不能不利用前人的的人生经验和智慧。

人类个体的生命诚然有限，人类绵延不绝的群体生命却是无限的。如果我们善于利用人类群体的人生经验，就可以减少人生旅途中的失误，避免“虚生之忧”，创造出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人生。

鲁迅曾感叹：“中国是古国，历史长了，花样也多，情形复杂，做人也特别难。”不过，古国、历史长也有好处，留给我们的人生经验也特别多。

中国文化以人人为中心，重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，重视处理人际关系的礼义道德。早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，就已经提出了系统深刻的人生哲学，教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世的道理。

二

先秦诸子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的思想。儒学创始者孔子提出以“仁”为核心的人生处世哲学。所谓“仁”就是“爱人”（见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；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。从仁出发，孔子又提出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的“忠恕”之道。孔子把“仁”看得比生命还重要，要求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

孔子认为：“礼”与“仁”相辅相成。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做人的标准，君要像君，臣要像臣，父要像父，子要像子，都

要合乎“礼”的要求。孔子既主张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，又提倡宽厚爱人，维护人的独立人格和意志。这是他思想中的内在矛盾。

面对不同的人生环境，孔子提出这样的人生目标和人生设计：“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（现）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

孔子的人生价值观是以道义为基本取向，而不偏重物质功利。他说：“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“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

孔子的言行记录在《论语》中。近人朱自清称这本书“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——孔子，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学问、做人的节目。”（《经典常谈》）《论语》也可视为一部人生格言录。书中许多睿智的话如“温故而知新”、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”、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、“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，则大事不成”，等等，至今仍然活在人们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中。

在相传为曾子所作的《大学》中，系统地阐述了孔子的人生处世哲学。《大学》开宗明义地说：

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

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，致和在格物。”

以修身为基础，达到圣贤的至善境界，达到治国、平天

下的至善境界。为了实现这种目的，就要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，不间断地日新其德，努力做一个新人，这就是《大学》倡导的做人的目标和修养方法。

战国时代的孟子把孔子的忠恕之道政治化，提出“仁政”思想，要求统治者关心人民疾苦，制民之产“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。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他提出的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的民本思想，在中国古代思想界，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空谷足音。

孟子提出著名的“性善论”，认为“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”；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这是四种善端，可以发展成为仁、义、礼、智四种德性。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，产生人类恶的行为。因此要修养身性，发扬本心的善性，同时要“求其放心”，找回丧失的良心。

孟子提出儒家的理想人格，即扩充美好的心灵，培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，做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的大丈夫。这种理想人格成为无数中国人的人生价值标准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。许多志士仁人正是在这种人格精神的鼓舞下，成就了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伟业。

孟子也以仁义为做人的最高标准。他认为仁义不仅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，也是人与禽兽的分界。他说：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，义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孟子说的“舍身取义”和孔子说的“杀身成仁”是完全一致的，都是把仁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

在人生设计方面，孟子的思想也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。他主张“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”，得志，泽加于民；不得志，修身见于世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许多中国人按照这种人生设计实现修己、济世的人生理想。

战国末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，在政治上吸收法家的思想，提出“隆礼重法”、“爱民用贤”的政治主张。在人生哲学方面，与孟子针锋相对地提出“性恶论”，强调学习教育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人之性恶，其善者，伪也。”（《荀子·性恶》）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教化，才能“积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圣心备焉”（《荀子·劝学》）才能获得高度的智慧，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。

荀子倡导的人格修养以礼义、忠信、仁爱为主。他说：“体恭敬而心忠信，术礼义而情爱人……劳苦之事，则争先；饶乐之事，则能让”；君子贫穷而志广，富贵而体恭，安燕而血气不惰，劳勩而容貌不枯，怒不过夺，喜不过予。（《荀子·修身》）这仍然不失儒家仁厚平和的谦谦君子之风；但“怒不过夺，喜不过予”，则表现了荀子重法的思想特色。

荀子推崇的理想人格是：“虽穷困、冻饿，必不以邪道为贪，无置锥之地，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”；“势在人上，则王公之材也；在人下，则社稷之臣、国君之宝也。”（《荀子·儒效》）这样的人即使是隐居在穷闾漏屋，也没有人不尊敬他的。这和孔孟提倡的理想人格是一致的。

三

和儒家思想互相对立、又互为补充的是老子创造的道家思想。老子用对立发展的眼光审视世界，看到一切事物都包含互相对立、互相依存的正反两个方面，正反两个方面的运动促使事物的转化。唯有永恒存在、无影无形、作用无穷的“道”，才是宇宙万物生成衍化的总根源。“道”流贯于宇宙、社会、人生。“道”是无为的，只是自然地运行。社会、人生也应该遵循“道”的原则；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（《老子二十五章》）因此，在政治上老子主张弃圣绝智，清静无为，回到远古的社会中去。在为人处世的问题上，他也主张贵柔守雌，虚静无为。老子说：

“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揣而锐之，不可长保。

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

功成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。”（《老子》第九章）

老子认为，持功自满，还不如没有功德好；显露锋芒，难保久常；金玉满堂，难以藏守，富贵而骄，自取祸咎；只有功成身退，才合乎自然的道理。

老子提出柔弱居下、与世无争、不为天下先的处世原则。他说：“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”（《老子》第七章）“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”（《老子》第二十二章）圣人谦让退后，毫不自私，反而能够得到人们的拥护，实现自己的愿望。圣人与世无争，反而没有人能争得过他。

老子揭示了强弱转化的规律，认为“坚强者，死之徒；柔

弱者，生之徒”，“强大处下，柔弱处上。”（《老子》第七十六章）在老子看来，坚强的东西意味着死亡，柔弱的东西充满了生机。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，优势往往在柔弱的一方，不在强大的一方。在这种认识基础上，老子提出“以柔克刚”的处世策略。

老子倡导“无私无我”的理想人格，认为世人过份看重名利，因而“宠辱皆惊”，得宠和受辱都担惊受怕，世人过份看重自己，因而“贵大患若身”，重视大患像重视自身一样。如果无私，还有什么可以担惊害怕的呢！如果忘掉自身，还会有什么祸患呢！老子认为，只有以贵自身、爱自身的态度去为天下的人，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。（以上见《老子》第十三章）

老子还教导人们要有自知之明。他说：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”（《老子》第三十三章），这些思想是非常深刻而又有积极意义的。

老子的人生处世哲学有明显的消极倾向。例如：他强调回避矛盾，不为不争，不为天下先，未免显得软弱油滑，不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。他看到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趋势，但没有看到转化必备的条件，因而把柔弱胜刚强看得简单化、绝对化了。不过他那充满朴素辩证法的深邃智慧，他那洞烛人生玄机的卓越思想，对我们有深刻的启示。他提出的“柔胜刚，弱胜强”；“大直若曲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”；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”等等，已化为我们民族的智慧，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学说。他把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发展为相对主义，把老子贵静守雌、处世不争的人生理

想，发展为逍遥游世的人生理想。

庄子认为：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 因是因非 因非因是，”是亦彼也 彼亦是也 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（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）贵贱、荣辱、是非以至生死的差别都是暂时的，只有作为宇宙本源的“道”才是永恒的。

庄子强调人的个体价值，回归到人的自然本性；反对以仁义、名辨和耳目之欲去伤害人的自然本性。他说：“夫孝悌仁义，忠信贞廉，此皆自勉以役其德（束缚自己的天性）者也（《庄子·天运》），不值得称赞；以富为是者，不能让禄；以显为是者，不能让名。亲权者，不能与人柄，操之则栗，舍之则悲，而一无所鉴，以窥其所不休者，是天之戮民也。”（同上）在庄子看来，那些盯着富贵名位孜孜以求的人，就像受自然的刑戮一样。

因此，庄子主张忘掉生死年岁，忘掉是非仁义，不受外物的支配，“无誉无訾，一龙一蛇，与时俱化，而无肯专为；一上一下，以和为量，浮游乎万物之祖；物物而不物于物，则胡可得而累耶？”（《庄子·山木》）庄子主张用这种态度摆脱物质世界的种种纷扰，争取精神世界的绝对自由。

怎样达到这种境界 庄子提出“心斋”与“坐忘”的修炼方法。

“惟道集虚，虚者，心斋也。（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）心斋”就是空明的心境。忘掉自己，泯灭意识的作用，保持空明的心境，自然能与“道”契合。

“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道，此谓坐忘。”（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）忘掉自己的身体，抛弃自己的聪明，同

“大道”融合在一起，这样就不会去掉自己的私好，随自然的变化而变化了。

然而物质世界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，精神追求常和现实相冲突。因此，庄子的逍遥游世又有“安时处顺”的一面，即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”；“外化而内不化”。外在的形体顺应万事万物，生而不喜，死而不辞，更不计较贵贱、贫富、是非、祸福；内心则不为世俗所累，保持超然物外的态度，以实现人格价值和精神自由。

庄子的人生哲学也有消极软弱的倾向。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，不是积极参与，促使它向有利的方向转化，而是消极逃避，想回到自我的狭小天地中，寻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。他的万物齐一的思想，反映出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。但是，庄子愤世嫉俗，对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”的不合理现实，表示出强烈的不满。他不随流俗，鄙弃功名利禄，为后世独立不羁、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树立了楷模。他从超越有限的更高层次去探讨人生问题，提出了奇特深刻的人生哲理。这种人生哲理又以奇丽生动的文字表现，对中国人的生理理想、人生追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四

儒道两家建立了各具特色的人生哲学体系。秦汉之后，两派互相排斥，互相吸收，此消彼长。西汉初期，从宫廷到民间，普遍推崇“黄老之术”，把道家的超凡脱俗和儒家的积极用世结合起来，应物变化，应俗施事，因时而动，无为而无不为。武帝时，尊儒兴学，注重教化，突出了儒学的主导地位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儒学衰微，玄学独盛。玄学家们热衷于谈玄析理，专注于理论思辩；认为“无”是万物的根本，也是人格的理想。他们好谈老庄，排斥世务，崇尚放达，轻蔑礼法，寄情于山水之中，追求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，在无为中达到与“道”合一。因此，玄学家们实际上是把道家的人生处世哲学，应用于魏晋六朝时期苦难深重的人生实践之中。

当儒道两家互相排斥、互相吸收的时候，又出现了另一种人生理论。这就是佛教的人生哲学。佛教是外来文化。东汉时传入中国。佛教提出“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”之说。认为“身譬如五谷之根叶，魂神如五谷之种实。根叶生必当死，种实总有终亡。”（《理惑论》）人的肉身必死，但灵魂不灭。灵魂在地狱中轮回以后，随度受形，来生的命运由今世善恶决定。“此生行善，来生受报”；“此生作恶，来生受殃”。佛教要人们安于现世的命运，积极行善，追求来世的幸福；以虚幻的来世的承诺，安抚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，给他们一种精神解脱的方法。

但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相冲突。时人认为佛出自西域，是外国之神，中国人不应该祠奉。认为佛教使人有毁伤之疾，髡头之苦，不孝之逆，绝种之罪，亡生之体，是“不礼之教”。佛教还与君道冲突，有“不敬王者”之罪。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，佛教便以佛理归玄言，迎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，实现佛教的本土化。至隋唐时期，本土化的任务已经完成，形成了天台宗、华严宗、禅宗、净土宗等中国化的佛教，其中禅宗是中国佛学最重要的流派。

传说禅宗是由印度菩提达摩于南北朝时期创立，传至五祖弘忍后分为南宗慧能和北宗神秀两派。北宗主渐悟，须

敛心入定，长期修炼，才能逐渐领会，逐渐贯通。南宗主顿悟 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。开始时 北宗显赫，南宗沉废。后来由于慧能弟子神会等人的大力提倡，慧能定为禅宗六祖，南宗遂成为正统。

由慧能的弟子整理惠能言行而成的《坛经》，反映了禅宗的基本思想。《坛经》认为：“世人性本自净 万法在自性”，人人所有的真常之心是世界的本源，众生皆有佛性，人人可以成性 佛法即是自性；“若识自性，一悟乃至佛地”不必经历累生累世修炼，一旦开悟 当即成佛；“百念为宗 无相为体 无住为本”心不受外界影响 心中不留外物表象，于诸法上无所留滞，虽处尘世，无滞无碍，来去自由。

南派禅宗不读经 不礼佛 不禁欲 不坐禅 免除了长期修炼之苦，只要顿悟，便可成佛。禅所追求的是一种摆脱尘世的种种羁绊、超然物外、大彻大悟、行止在我、清纯闲适的生活情趣。这很适合一些士人的口味，他们纷纷到禅理禅趣中去寻求精神寄托。至两宋时期，禅悦之风，遍及士林。

五

儒家、道家和佛教为人们提供了三种人生哲学和处世原则。

儒家提供的是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原则，以修身为本 完成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功业。人人都有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责任，人类个体的人生价值实现于人类的群体价值之中，实现于伦理道德的精神追求之中。因此，儒家重道义，重气节，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。但治国

平天下的理想不是任何人、任何时候都可以实现的，理想常与现实相矛盾。于是儒家又强调安贫乐道，涵养德性，通过塑造高尚完美的人格来实现人生价值。这样，儒家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原则，便可以适用于处于不同环境、不同条件的个人，获得广泛的应用价值。

道家提倡的是避世出世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原则。道家主张虚静无为，顺应自然，游心于物外，不为物态俗情所累。道家重人的个体价值和人格独立，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。魏晋玄学家发挥“逍遥”的思想，认为逍遥有不同的境界。常人安于性分、适性自得即是逍遥。只有至人能够无我、无为、无名与天道一体，才能达到“绝对自由”的逍遥境界。不过这种逍遥游世的人生理想是庄子的发挥。若从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来比较儒道两家的人生哲学，我们可以看到：儒家的人生哲学偏重于理想，从成圣成贤的要求出发，提出人生的目标和要求。因此，有的学者认为，儒家的人生哲学是士大夫的，不是老百姓的。道家的人生哲学是直面现实的，特别是老子所说的，都是饱经人生沧桑之后得出结论，在人生实践中有实用的功效。老子不是讲人生应该如何，而是讲人生的实况，告诉你应该如何应对处理。老子不仅讲处理人生问题的原则，还讲处理的策略和技巧，由于以上原因，在中国人的人生实践中便出现儒道并用、儒道互补的局面。

禅宗提倡的是在世而出世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原则。佛教本来要人们脱离红尘，寄希望于来世。但现世苦难，来世茫茫；为了解决这个矛盾，禅宗提出出世不离入世的主张。慧能说：“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

角。”佛法就在世间，离开世间去寻找智慧，就像寻找世上没有兔角一样。于是禅师们便出世而不离世；人生的价值取向不在来世，而在现世；也不仅仅是寻求个人解脱，还要普渡众生。禅师们追求的人生理想是：看透人生的真相，斩断一切欲念是非的烦扰，保持清静空明的心灵，遇事随缘应对，不为过去而懊丧，不为未来而忧虑，享受自由适意的人生。禅宗的人生理论沟通了儒家的入世精神和道家的出世精神、为立志进取、又屡遭挫折的人们提供一种心理调节的方法。近人朱光潜总结弘一法师（李叔同）的人生经验时，曾经提出“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”的人生理想。出世精神使人超脱豁达，宠辱不惊；做入世事业，使人有所作为，有益于社会和人民，不致虚度年华，浪费生命。这样，禅学便作为儒学的有益补充，进一步世俗化、生活化了。

唐代三位大诗人可以代表儒、道、佛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。杜甫把个人生命投入社会群体中，处贫困之境不失济世之志，对国家和人民怀着深沉博大的爱，代表了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。李白如天马行空，傲岸不驯，蔑视权贵，张扬个性，追求理想，渗透了道家重个体人格价值的精神。王维熟谙禅学，晚年隐居辋川蓝田别墅，以清静淡泊为生活情趣，常在清静淡泊中化入天人契合的境界，反映出禅者自然适意的人生态度。

六

中国古代的人生处世哲学大体上是以儒家为主体，以道家、禅宗为补充，形成完备深邃而又多彩多姿的理论体

系。两宋以后，文人学者们又进一步做精致化和普及的工作。程朱理学就是以儒家为主体，吸收佛道思想建构而成。理学家们讲究“三纲”（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）“五常”（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），注重个人的修养和气节。理学是精致的哲学体系，也是实用的人生哲学。朱熹把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和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合编在一起称为《四书》加上“章句”注释，作为人们修养心性、处理事务、治理国家的基本教科书。

明清之际，各种矛盾交织并发。一些失意文人退处山林之下，又不能忘情世道人心而思有所作为，于是汇编名贤的良言雅训，采集民间的嘉言谚语，或自述人生感悟。其内容涉及修己之道、人伦关系、治家方法、从政方略、处世准则等各个方面。这些著作不是抽象的思辩和深奥的玄谈，而是实际的人生体验和处世技巧，语言精炼，内容简朴，适合各阶层人士的口味。可以举出三种代表性的著作：

吕坤的《呻吟语》吕坤是明万历二年（公元 1574 年）进士，当过刑部左、右侍郎，万历二十五年托病辞官。他居官勤于政事，居家努力学问，敢于直谏，严于律己。《呻吟语》是他根据观察社会、人生所得写成的，有多种版本印行，以清道光年间的栗氏刻本（栗毓美等编刻）收集较为完备。清人阮承信曾根据陈宏谋的节录本再加精选，编为上下两卷。上卷分天地、圣贤、修身、处人、应事、居官等 22 目，下卷是补遗，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。阮承信在本书序言中说：《呻吟语》皆从圣贤书中推衍而出，大有补于世道人心，士大夫立身行事，事君临民，皆当以此为法。这本书明清时期颇有影响。

洪应明的《菜根谭》洪应明字自诚，号还初道人，生平

事迹不详。可能是一位隐居田园的文人，一生坎坷而能坚持高尚的情操。书以“菜根”命名，是根据宋人汪信民的名言：“咬得菜根断，则百事可破（又作“人能咬得菜根，则百事可做）。菜根是果叶的根本，那末本书也是作者讲为人处世的根本道理。书的内容涉及为人处世的各个方面，采用对仗工稳的楹联诗赋句式，富于哲理性，读时琅琅上口，读后耐人寻味。其思想以禅理为主，兼收儒家道家思想，体现了一种把积极入世与超俗出世融合为一的人生处世哲学。这本书除在国内流传外，还传入日本。日本现代企业家把《孙子兵法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用于企业竞争，把《菜根谭》用于处理人际关系。本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蔡志忠的漫画菜根谭在国内大量印行，使这本书为广大现代读者所熟知了。

《增广贤文》：这是一本大众化的人生处世哲学，在民间家喻户晓，影响非常深远。这本书初名《昔时贤文》，又名《古今贤文》，后来经过修订改称《增广昔时贤文》，简称《增广贤文》。编者已不可考。《增文贤文》将圣贤名言（如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、“居安思危”）和民间格言（如“忙中多错事，酒后吐真言”；“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”）雅俗并集，以俗为主，精炼深刻，通俗易懂，蕴涵着丰富的人生智慧，铸就了中国老百姓的传统道德和处世原则。

此外，明末清初出现的论为人处世的读物还有陆绍珩的《醉古堂剑扫》、屠隆的《要罗馆清言》、关从先的《小窗清记》、宋纘的《古今药石》、敖英的《慎言集训》、陈继儒的《安得长者言》、魏裔介的《琼琚佩语》、申涵煜的《省心短语》、申涵光的《荆园小语》，等等。这些书多数是汇辑前人的言论和故事，因此作者们做的是人生处世哲学的普及工作。

七

上面说的就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人生经验和处世智慧。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经验和智慧呢？

时代发展了。我国已从封建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，从封闭保守、节奏缓慢的农业国家向开放的、快节奏的现代化工业化国家转化。我们所处的时代、所担负的历史任务、所面临的广泛多样的人际关系，都和古人迥然不同。我们自然应该有新的世界观、人生观，新的处世原则和方法。但新的理论、观念、原则、方法不是凭空产生的，需要以前人留下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，作为参考和借鉴；然后结合新的实践经验进行创造，才能建构起新的理论体系和原则方法。毛泽东说：“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。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，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，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”。（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）毛泽东提出的对待古代文化的方针，自然也适用古人关于人生问题的经验和智慧。根据现实的生活条件和需要，对古人的人生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可以采取以下的原则和处理方法：

大力弘扬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优秀传统。例如：儒家重视对道德价值的追求，把人的德性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而区别于禽兽的基本标志。儒家倡导利世济民、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，赞颂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创造进取精神，推崇“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”的崇高气节和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浩然正气。凡此种种，至今都有

很强的现实意义，需要大力提倡和发扬。现在，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加速经济发展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。但经济建设要和思想道德建设同步。如果经济发展了，道德滑坡了，不仅会阻碍社会的协调发展，也会导致人的自身价值的失落。因此古人重视道德价值的思想今天并未过时。另外，我国仍然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，内有困难，外有压力。处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优势下，有些人容易产生民族自我迷失的心理，一切都是外国的好。因此强调振兴国家、民族的历史责任感，保持国格、人格的尊严，崇尚气节操守和道义责任。也是非常重要而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。

纠正古人人生理论的偏颇方面，作出全面合理的新结论。例如，先秦诸子在人生价值观方面，偏重精神价值，但并不否定物质功利，而他们的继承者们却加以片面发展，以至走到君子不言利、空谈心性的地步。今天，我们应该把“义”与“利”统一起来。义即天下人民之公利，公利自然不应反对。个人的私利在合理的范围内也应该保护，但不能损人利己，不能以私利害公利。从人生价值来说，物质利益并不是我们追求的全部目标，我们还有更高的精神道德追求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提升人的价值，获得心灵的平静、充实与欢乐。因此我们既要重视物质功利，又要以义导利，以义制利，使物质和精神得到和谐协调的发展。又如，儒家重群体价值，道家重个人价值，我们的新的人生价值观则应该把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统一起来。人类的个体生活于人类的群体之中，不能奉行个人至上主义；另外，也不能否定个体价值，如果个体价值不能实现，群体价值也会落空。